

历史的召唤 延安文学的复杂化形成

袁盛勇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历史的召唤

延安文学的复杂化形成

袁盛勇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的召唤:延安文学的复杂化形成 / 袁盛勇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 7

(中国社科专著文库/樊景良主编)

ISBN 978-7-104-02661-7

I. 历… II. 袁…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3081 号

书 名: 历史的召唤:延安文学的复杂化形成

责任编辑: 王媛媛

封面设计: 张玉霞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

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8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338 千字

印 数: 3000

版 次: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661-7

全套定价: 200.00 元 (本册定价: 34.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序 言

吴立昌

记得五年前招考博士生，我出了个有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的口试题，只是问考生这篇文章看过没有，大致讲些什么内容，并不要求对它做什么评价，主要为了测试一下考生对《讲话》关注的程度，因为它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被问到此题的考生回答都很诚实：没看过就是没看过；能说出点内容的，也承认是从文学史教材上知道的。但认真读过并能较全面概述其内容的似乎没有，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想不到当年没被问到此题的袁盛勇却在日后下了研究延安文学的决心，并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间，诚如他本人所言，几乎殚精竭虑地思考并言说着这个论题。近年来，袁盛勇在延安文学研究方面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论文，《新华文摘》等国内重要期刊也多次予以转载，而其基本内容，大都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现在这本《历史的召唤：延安文学的复杂化形成》便是他这五年来就此论题“殚精竭虑”研究的成果。

该书主要探讨延安文学的复杂化形成，在作者看来，延安文学由前期走向后期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嬗变过

程。我以为，这个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正如作者所指出，延安文学是个伟大的历史性存在。伟大的意思当然就包含了这种复杂性在里边。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体现了充分的伟人气度，他不仅在政治、军事方面显现了非凡的才能，而且在文化建设上也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他在当时建构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文化体系就是前无古人的。谈到延安文学尤其是后期延安文学的形成，必然会谈及它与上述文化的关联，也自然会论及文学与政治的关联。其实，无论从文还是从政，怎样处置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双方都很感棘手。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但是，“厌恶和尚，恨及袈裟”，人们此后便不屑再谈——说实话，也很难谈得清——这个话题，而将注意力转移到“纯文学”、“日常生活”方面，从而多少有点冷落了延安文学的研究。然而，本书作者却敢于直面这个棘手问题，肯定“现代中国文学与现代中国政治文化之间本来不可分割的广泛联系”，并在历史流程中对其复杂性作动态的审视。由此，作者自然就谈到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化问题。“意识形态”在当下某些学人眼里，由于历史的原因，好像带有相当的贬义，其实这是一个曾经发生了并且现在还在发生着积极影响的一种政治文化观念形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谁也离不开意识形态的潜在支配，因此，应该把它当作是一个积极的，能动的，至少也应该是一个中性词来理解，尤其在一个追求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里。对于“意识形态化”的复杂性，作者论述深入细密，新见迭现，史料丰赡厚实，耐人寻味。本书的可贵之处，我以为，不仅在于作者有理论勇气突破沿袭多年的先验的理论框框，既善于汲取学界研

究新成果，又能坚持自己的识见，而且在于他对历史的尊重及在此前提下对延安文学所做出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比如，对于延安的“集体创作”，在总体上作者是倾向于批评的，因为它有可能完全剥夺了个人的创造力，且成为后来“三结合”写作模式之滥觞。然而，在谈到“提倡工农同志写文章”时，作者却充满感情地说：“我认为，能够让以前默默枯死在底层的民众有着这样的生存感受，而且是立足在大众文化学习和写作锻炼之上，这对当时经济文化还异常落后的边区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历史进步。我想，后来者在对延安文化运动所取得的成就的评价上，不承认这点，是不符合当时边区民众的真实感受的。”年轻学人能抛却另一种偏见做到这个程度，实在难能可贵。

《共产党宣言》里说，“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阶级总是凭借其权力强制社会全体成员接受它的政治、法律、道德、艺术等观点，接受它的世界观。作为共产党治下的延安文学，毫无例外要被纳入党的思想轨道。当延安文学在这方面的复杂化形成被仔细梳理、深入剖析清楚之后，建国十七年乃至“文革”十年的许多复杂甚至荒诞的文学现象也就迎刃而解。关于延安文学观念的现代性，作者很有创见地论证了从“民族—现代性”到“阶级—民族—现代性”再到“党的一民族—现代性”的转换过程，逻辑严密，令人信服。自“党的文学”浮出地表之后，文学的路子便越走越窄，比如文学反映生活的问题，作者就尖锐指出，“毛泽东并没有多大创见。他的创见应该说体现在对‘生活’的限定性说明上。”但其结果必然是，“现实生活几乎全部政治化

或意识形态化了”。生活就是政治生活，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文学反映生活就是为政治服务，甚而就是为了图解某项党的政策，直至“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文学被强行绑在政治的战车上，几十年不就是这样跌跌绊绊走过来的吗？直到当今，我看也没完全走顺，尤其是在新环境中又多出个“经济”的因素，更加纠缠不清了。

从观念上看，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与延安文学并无本质区别，一说文艺是宣传，是“留声机”；一说文艺是整个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意思一样：文艺必须成为革命的工具、武器。二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当年只是文坛之一派，它可以宣传自己，批评别人，但还不具备“武器的批判”的能耐，因此被批评者也可反批评，我行我素，根本不买你的账。后者则完全不同，它背后有强有力的政权做支撑，从观念到实践，文学都得听命于他。延安的文艺家，虽然身在延安，但观念并不完全符合政治家的要求。怎样让其就范？本书由此提出了“延安文人心态的‘有机化’形成”的问题。作者发现，“《讲话》的核心确乎是为了阐明党的文艺观念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文艺整风即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而非其他。”“有机化”是作者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那儿借用的说法，在书中其实就是指意识形态化。在文艺整风中，文艺观念意识形态化和文人心态意识形态化是同步进行的。如果说本书论述前者以开阖自如的宏观阐述见长，那么论述后者则以鞭辟入里的微观分析取胜。作者提纲挈领，以“政治实用主义”一词很自然地将二者联结起来。于是，从文的文人、知识分子，和他们所从事的文学一样，也必须是工具。革

命政党自然有高远理想，但最切近的目标，在全国是夺取政权，在解放区便是巩固政权。为了这个目标，作为文化军队的文人、知识分子，与“武化军队”的军人一样，也要一切行动听指挥。从自由文人到听话工具，作者不乏生动地勾勒出一幅延安文人从短暂的自由心态的获取→自由心态的失落→自由创作心态的终结→权威崇拜意识产生的清晰图画。如何保证每个文人都能走完这一流程？这就需要一套“规训与监督”的机制。于是作者从延安的文艺批评特别是对王实味的批判中，揭示出那时便已形成一个“具有组织化或专政化内涵的思想批判机制”。这样层层递进的分析，不但是对历史的尊重，其现实意义亦不言自明。

为什么作者在谈论延安文学和文人心态的意识形态化后又要专谈“鲁迅传统”的形成？因为“它的形成过程其实亦正是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对延安文学与文化进行不断规训的过程，也是对延安文人和知识分子进行规训并促使其走向自我驯化的过程。”经过对这一过程的分析，作者发现，“一方面，鲁迅的创作传统及其精神风范正呈现出被不断给以弱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作为革命家的‘鲁迅’却以此为依托，在延安政治—文化界的强力型塑下，正步履矫健地走向人间，凸现在世人面前。”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始终是从他正在创构的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需求着眼的，带着很浓厚的政治实用主义色彩”。正是从这个角度，作者认为，“毛泽东对鲁迅作品尽管非常熟悉，但他与鲁迅的心是不可能真正相通的”。其实，毛与鲁都是伟人，自有其相似之处，但至少

在如何看待文艺的性质和功能方面，他们的基本出发点不一样，鲁迅认为艺术真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沾沾于用，甚嫌执持”；尤其对文艺的政治功能，并不怎么看好，“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所以，他明确声言：“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而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由此出发，两人对许多文艺问题自然难以想到一块去。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的鲁迅，最重视个性的张扬和解放，他自己就是一个最有个性的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五十年代胡适则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两人角度不一，但都说出了一个“真实”：鲁迅具有毫不妥协的坚强个性。然而，伴随着以《讲话》为标志的延安文学意识形态化的形成，延安文人、知识分子也被迫经历了一段“脱胎换骨”的“苦难的历程”。他们的个性，因此而迅速地消融于共性、党性之中，正如书中所分析的，他们大都怀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自卑感和忏悔意识、自虐色彩：“正是在这带有自虐色彩的忏悔当中，属于知识分子和人的自我本性不断遭到被剥离的厄运，人的尊严感终究被不断增强的自卑所代替”。这就是通过整风运动所取得的成果，倘若鲁迅活着，恐怕也是他最不愿见到的景象。

“文革”过后不久，我曾在图书馆翻了一阵子天津的

《大公报》和《益世报》，看到两篇沈从文对记者的谈话，在谈到他的去了延安的朋友丁玲、何其芳时，他说：“丁玲他们为什么去了，反倒没有什么作品了呢？”“他们是随了政治跑的”，“假若国家把作家都放在宣传部里，那成什么样子！”当时虽然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但又觉得他是否也带点情绪把话说得太绝对了。随着以后延安整风史料的大量披露和许多当事人回忆录的出版，有力地证明了沈从文当年的看法很直白、实在，而即将面世的袁盛勇这本论著，则是在清晰梳理延安文学来龙去脉的基础上对其历史经验的一次很好的理论总结。看来，二十多年后那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革文化命”的疯狂十年，似乎也是一种“宿命”。

在为这篇序文起腹稿时，无意间读到两篇文章，对我很有启发。一是记著名记者、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的（《炎黄春秋》2006年第9期）。作者说，李普一直保持知识分子那种独立、率真的气质，“我多次听李普说过这样的意思，他之所以能保持知识分子的‘原汁原味’，因为他没有去过延安，他是重庆的干部。只有经过延安整风的‘洗礼’和抢救运动的‘磨练’，才会‘夹着尾巴做人’”。另一篇是谈胡适与中共恩怨纠葛的（《海上文坛》2006年第10期）。说是在1948年末，中共挽留胡适未成，1956年，时任外交部顾问的胡适老友周鲠生，通过寓居伦敦也是胡适老友的陈源不止一次劝说胡适回国。陈氏写信给胡转述周的意见，在提到前两年大陆的“胡适批判”时有这么一句：“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胡适收到信后，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一条线并批注云：“除了

思想之外，什么是‘我’？”此话极是，对于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思想自由就是他们的命根子。

前些时我曾在一篇文字里对知识分子长期做“工具”的现象，发了几句感慨：“五四时期高歌‘我是我自己的’的老一辈，进入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近三十年间，就渐渐失去‘自己’，最后完全没有‘自己’；我们这一辈，自懂事起，似乎从来也没有过‘自己’。仅从失去‘自己’或没有‘自己’还要奉命作文或虽未奉命但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一点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是很可怜很可悲的。‘忆苦思甜’，如今年轻一辈写文章自然有了许多‘自己’，但面对主观的修炼和客观的制约，我们在寻找或坚持‘自己’的道路上究竟又走了多远？”

我真切期望盛勇能在这条道路上走得远些，更远些。

2006年10月19日

鲁迅逝世70周年写于上海

目 录

序 言 吴立昌 /1

绪 论 问题与方法:延安文学研究刍议 /1

第一章 延安文学观念的形成 /20

第一节 民族主义:延安文学观念形成的最初动力和
逻辑起点 /21

第二节 民族—现代性:“民族形式”论争中延安文学观念的
现代性呈现 /35

第三节 阶级—民族主义与“党的文学”观的出场 /56

第四节 “党的文学”:后期延安文学观念的核心 /69

第五节 “党的文学”与延安文学观念的总体性形成 /93

第二章 延安文人心态的“有机化”形成 /129

第一节 难得自由:文艺整风之前的延安文人 /131

第二节 自由的失落:延安文人的新生 /146

第三节 规训与监督:自由创作的终结 /182

第四节 崇拜与认同:延安文人“有机化”心态的
最终形成 /200

第三章 延安时期“鲁迅传统”的形成 /220

第一节 鲁迅启蒙小说传统的不断弱化 /222

第二节 鲁迅杂文传统的不断阉割与转换 /230

第三节 政治性:毛泽东的鲁迅观 /244

第四节 诠释与转换:鲁迅传统的意识形态化形成 /254

第四章 意义的制作与凸现:延安文学创作实践及其

意义构成 /276

第一节 集体创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写作方式 /277

第二节 集体创作与后期延安戏剧作品的形成 /289

第三节 “提倡工农同志写文章”:工农写作的

话语指向 /309

第四节 “民间”的意识形态化 /320

余 论 延安文学由“党的文学”转换为国家的文学 /346

主要参考文献 /363

附录一 直面与重写延安文学的复杂性 /374

附录二 论周扬延安时期文艺思想的构成 /383

后 记 /406

绪 论

问题与方法：延安文学 研究刍议

延安这个直接并最终催生了社会主义中国的革命圣地，无疑与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进程有着密切关联。1950年代后近三十年间紧紧规制着人们心灵的毛泽东思想，正是完整形成并牢固确立于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日渐辐射并统摄到中共领导的各个领域，并在新中国建立后一度成为广大知识分子不可抗拒的规范性力量。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形式，它涵括在文化之中，因此，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正在积极创构并最终成形的新的意识形态话语自然会对延安文学的形成、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决定性影响。正因如此，延安文学就必然不仅仅是一种具有地理区域性的文学，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这种文学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政治性影响，更为令人关注的是，它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共领导地位的牢固确立而由党派文学转化为国家的文学并由此对以后的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产生了某种毋庸置疑的决定性影响。这表明，延安文学不仅存在于延安时期，更在1949年后凭借其所属意识形态话语权威的延续而富有宿命论意味地楔入了共和国文学的血脉中去。正因如此，我认为，共和国毛泽东时代的文学并非如太阳那样是在某个时刻从天际冉冉升起，而是出现在它自身赖以形成的传统中。换言之，传统学

科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 1949~1976 年间的中国文学并非它本身自行其是的结果，而是现代文学中某些传统制约的结果，饶有意思的是，这些传统又是经由延安文学这一党派文学在 1949 年后通过其强有力的体制化渗透、改写和重塑而成。因此，如果想深入探究 1949~1976 年间中国文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质，就必得追寻延安文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质的构成，否则，人们对中国文学在 1949~1976 年间的完整状貌的形成就会缺乏深入理解，也就不可能真正把握这段文学发展进程的内在肌理。正因如此，探究延安文学的形成及其特质的构成自然会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界某种不可或缺的探源性工作。

倘若采取整体性的新文学发展眼光来看，延安文学在二十世纪中国左翼文学发展史上更是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它仿佛成了一个影响中国左翼文学在日后更为激进发展的重要穴位。在左翼文学的发展链条上，延安文学显然继承了 1930 年代普罗文学和苏区文学的不少革命性传统，但也形成了某些与之迥然不同的要素，这些要素的形成自然是与某种政治文化氛围的不断强化密切相关的。因此，如何看待延安文学对此前左翼文学传统的承袭，又怎样认识延安文学自身之独异性传统的形成，就成了一个非常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在我看来，左翼文学在三十年代由于创造社、太阳社等不同团体的革命作家与鲁迅、茅盾、瞿秋白、冯雪峰、胡风以及周扬等人的共时性存在而呈现出复合型特征，因而在其传统内部回响着并不完全同质的种种观念的碰撞声，这一传统也因之成为一个充满了悖论和张力的丰富性存在，借助巴赫金的术语来说，它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类似复调式结构的那样一种存在。有意味的是，在民族主义思潮的驱使下，这一复调式存在也曾一度呈现在延安文学发展的初期。但 1942 年文艺整风后，左翼文

学在三十年代形成的某些丰富性传统遭到了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的不断阉割、改写与重塑，换言之，在新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其丰富性在难以抗拒的转换性生成语境中遭到了被不断予以剥离的厄运。文学又成了一种曾被鲁迅等人予以严正批评和反对的意识形态化宣传工具，文学的发展问题在新的政治文化的规约和同化下其实转换为一个延安文学如何遭遇意识形态化的命运问题。于是，文学赖以发展的动力和构成其本质的决定性要素并非存在于文学的审美本身，而是取决于新的意识形态的形成。这里所言的意识形态其实是指一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指政治意识形态。因此，在本质上，延安文学的最终形成并非左翼文学之丰富性传统在四十年代的进一步发展，它构成了某种相对后者之丰富性状貌的回落；但换个角度，也可以认为它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之内在政治性传统在新的语境中走向极致的结果，因为在鲁迅、茅盾等人创构的左翼传统之外确实还存在着自“革命文学”论争期间形成的那种执意趋向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文学传统。因此，即使仅从延安文学与此前左翼文学传统的接续与变异来考察，延安文学的形成已经显现了某种复杂性。倘若把它与苏区文学、民间文学、传统文学乃至世界左翼文学的关系再考虑进来，那就更显微妙和复杂了。

所以，无论是从理解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尤其是1949～1976年间文学的形成，还是从更高视点理解中国左翼文学的嬗变而言，都有必要对延安文学进行全新研究与深入探讨。更何况，延安文学本身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也非如以往研究者揭示的那样单薄，它有着某种在单纯之中凸显而出的复杂性特征，如果联系其形成过程来考察，这种复杂性特征就更为突出了。因此，即便把它从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之流中截取出来予以静态式研究，也是颇有价值的。二十世纪后半叶，人

们对延安文学的阅读和研究都曾表现出强烈兴趣，这在政治意识形态统摄较为浓厚的时期更为明显。但现在看来，人们对它的理解和研究却成了一个问题。愈是透彻研读过延安文学作品和以往相关研究成果的年轻学人，就愈会觉得延安文学具有值得深入开掘的研究价值，就愈会觉得过往的延安文学研究不但没有成为大家进一步理解延安文学的桥梁，而是成了某种绊脚石，成了某种阻滞深思的障碍。简言之，延安文学研究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日益凸现成为一个全新的并且有待高度关注的问题。那么，延安文学研究何以会成为一个问题的呢？在我看来，这首先是为以往意识形态话语尤其是新民主主义理论视阈所深深决定了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最初运用始自周扬。1939~1940年间他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为授课而撰写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中即出色运用了毛泽东刚刚创构出来的新民主主义理论。1949年后，这一理论更是成了整个中国学术界的主流理论乃至唯一正确性理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由于其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特殊性，由于其担当着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及其全部历史提供合法性证明的特殊意识形态功能，因而，新民主主义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影响尤为深远。一切只有符合这一理论要求的历史对象才能进入研究领域，一切只有遵循这一理论要求的价值判断和学术评价才能为官方机构所认可，否则，就会遭致官方意识形态机构的严厉批判。在此种状态下，延安文学不仅成为一种带有宿命论意味的合法性存在，而且担当了共和国文学得以持续发展的逻辑前提并为其提供了直接的文学性资源。正因如此，人们对延安文学无不表现出狂热认同，并且对其给予了亘古未有的极高推崇或评价。这在刘绶松、唐弢等人撰写的文学史论著和教材中得以异常清晰地凸现出来。他们对延安文学的高度